

后危机时期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前景

王玉主

【内容摘要】 1991年开始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开始显现出比较明显的特点：即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同时经济合作水平与双边关系的发展存在捆绑现象。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但本文认为，后危机时期双边经济合作的基本特点不会改变，只是随着中国力量的上升，双边经济合作、相互依赖对双边关系的推动作用会逐步下降。

【关键词】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 相互依赖 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 F1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6052(2010)03-0096-05

自199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通过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带动一直维持着稳定的发展，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2008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已经超过2300亿美元。双边投资也逐步从东盟对中国的单向流动逐步朝着相互流动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双边经济关系的这种相互依赖已经形成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分工模式，对不同程度依赖出口的双方经济增长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目前，仍处在危机恢复期的中国和东盟已经迈进了自贸区时代。那么，在后危机时期，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前景如何呢？本文将从分析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特点入手，对后危机时期中国东盟双边经济合作的发展前景作初步探索。

一、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核心特征

虽然中国与很多东盟国家通过贸易、投资等方面的联系历史悠久，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与作为区域组织的东盟在冷战结束之前并没有正式的官方联系。因此，讨论中国东盟合作的一个共识性起点就是1991年钱其琛副总理出席东盟第24届外长会议。中国东盟经济联系自合作以来日益密切，并逐步推动了经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总结中国东盟过去近20年经济合作的实践可以看出，双边经济合作显示出以

下几个特点。这些特点基本上决定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利益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一) 双方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相互依赖关系日益深化

从双边货物贸易情况看，2008年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比1991年增加了26.5倍，达到2311亿美元，约占当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9%。从表1给出的数据变化可以看出，1991年以来，东盟无论是作为中国的出口市场，还是中国进口商品的来源地，对中国来说都变得更加重要。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从东盟进口的份额增加明显高于中国对东盟出口份额的增加，说明东盟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发展得更快。

这一结论也得到来自东盟方面统计资料的支持，根据东盟秘书处公布的数据，2000年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只占东盟对外贸易的3.5%左右，这一数值在2004年上升到7.5%，到2008年则进一步增加到9.7%。进口方面的经历于此类似，2000年东盟自中国的进口占东盟进口总量的大约5.2%，2004年增加到9.7%，2008年增加到12.9%。

从双方直接投资看，近年来中国东盟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FDI)已经逐步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

收稿日期：2010年4月12日

作者简介：王玉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副研究员，区域合作研究室主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东盟关系、东亚合作。北京，100007。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区域合作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的支持。作者感谢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周小兵研究员、朴光姬研究员以及高程副研究员提出的宝贵意见。

动。东盟国家自1995年以来一直是对华投资的主力。截至2007年,东盟总计对华投资30963项,协议投资额1037亿美元,实际完成465.5亿美元,是我国前五位的直接投资来源。2008年次贷危机并未影响东盟对华投资,仅新加坡等五国2008年的对华投资额就达到51.2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也因此有了非常显著的增加。根据东盟秘书处的统计,仅2006-2008年三年时间内,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就达到36.8亿美元。其中,2008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14.4亿美元,大约占东盟当年外资总额(602亿美元)的2.4%,超过东盟长期以来重要投资来源国——韩国,列在东盟外部直接投资来源的第四位。

(二) 制度层面上,《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双边经济合作创造了非常良好的机制

在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同时,双方为经济合作达成的制度化安排也随之确立并逐渐迈向较高的层次。1991年7月,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国,这应该是东盟给予与之关系一般的国家的合作地位。此后5年中,中国一直以东盟的磋商伙伴开展与东盟的经济合作。考虑到中国和东盟在冷战时期的长期相互敌视和对立,以及当时双方仅有84亿美元双边贸易的脆弱经济联系,东盟如此冷淡对待中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从经济合作角度来看,这种伙伴关系,甚至后来东盟给予中国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地位都不能被看作是有效的制度化安排,但这一关系的确立促使中国东盟双方在后冷战时代摆脱对立、迈向合作,实际上成为双方经济合作逐步迈向机制化发展的重要基石。后来,随着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东盟经济合作逐步走上机制化轨道。而把10+1合作向自贸区建设推进是中国深化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机制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因为它实际上把双方的相互依赖纳入了制度化保障的框架。自贸区规定的《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以及《投资协议》必然会通过对双边经济合作的推动而深化双边的相互依赖程度。

(三) 经济合作与双边总体关系的捆绑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重要特点

经济合作本身是涉及两个或以上参与者的一种博弈过程,它不仅描述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本身,更是超过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本身的、各参与方从各

自利益诉求出发、通过综合力量的博弈而形成的一种承载着各方利益安排的制度化结果。因此,至少对中国来说,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推动双边关系的切入点,担负着推动中国东盟双边关系发展与深化的重任。由此不难想象,经济领域合作的目标不仅仅是经济福利,超经济诉求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样看来,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既是双边关系的一部分,又服务于双边关系的发展,它因此也必然受到由各种力量综合决定的双边关系的影响。

二、后危机时期影响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可能因素

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一直是在经济全球化、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并逐渐参与国际、区域事务这一宏观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及其引起的全球力量结构的变化,成为左右中国与东盟关系的重要因素。此次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并重创了美国经济,虽然到目前为止关于其对美国经济地位的影响尚无定论,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的相对崛起,这对一些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不愿接受的事实。因此,金融危机也将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及双边经济合作。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大国的期望及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促使其更积极、深入地参与地区乃至全球事务,尤其将要求中国更加平衡地处理与邻国、周边地区的关系。这种变化将会影响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与此同时,东盟通过共同体建设推进的一体化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地位,而其试图通过把有关大国引入东亚合作框架的努力也成为影响中国东盟关系合作的因素。因此,本文认为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东盟经济合作将受到以下三种力量趋势的影响:

第一种趋势:中国经济崛起可能引发中美直接竞争,进而制约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深化。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其GDP总量将很快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相比之下作为日益衰落的霸权,美国自然感受到某种威胁。2008年底爆发的次贷危机以及随后关于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论争,则加重了美国的威胁感。作为核心利益已经内化在当前国际体系之中的全球霸主,美国可能会改变“9·11”事件以来积极对华合作的战略,而体现更多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

会回到冷战时代，而更可能是通过某些手段“管理”中国经济增长。最近炒得比较热的中美轮胎特保案就显示了这方面的苗头。而在G8+5、G20框架下的合作，虽然标志着中国地位的提升而使国人欢欣鼓舞，但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中国必将为此有所付出，无论是温室气体排放方面还是人民币汇率方面的承诺，都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约束。至于被称为G2的中美战略对话，则至少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看来更像是中美互相管理而不是一些国人津津乐道的中美共同管理（世界）。^[1]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也开始或重新给予关注。今年上半年美国借助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重返东南亚”，以及此前美国军队重新加强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合作，表明美国并没有完全走出冷战思维，至少清晰反映出其制约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的意图。

东盟国家长期以来奉行大国平衡外交，而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得以深入发展的一个结构性背景就是冷战后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如果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崛起而变得竞争性日益加强，则会挤压东盟通过平衡外交处理大国关系的空间。如果在近期内东盟被迫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东盟将不得不牺牲对华关系。^[2]

第二种趋势：作为一个日益被接受的大国，中国将不得不推行更加均衡的周边战略，一旦中国的周边外交重点转向，将会使东盟国家感觉被冷落。在双方尚有领土争议、大国在东南亚地区有利益之争的背景下，中国东盟关系存在恶化的风险。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责任要求将会越来越多，例如此次危机期间出现的中国责任论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因此，不论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也不管中国是否愿意这样做，它都必须对这些呼声做出反应。与此同时，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必然依赖其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总体外交战略布局虽然在一些学者看来重点不够突出，但它反映了崛起中的中国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要求。在利用“10+1”合作与东盟国家建立起稳定的合作关系后，中国又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了与中亚邻国的关系。虽然中国一再强调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但去年开始启动的东北亚峰会还是让东盟疑虑大增。有些东盟学者认为一旦东北亚合

作取得突破，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将是可有可无的。

由此看来，尽管解决东北亚合作、尤其是中日合作问题被认为是东亚合作迈向深入的共识性基础，但东盟国家对东北亚合作的担心说明中国在处理周边合作问题上面临着两难，这将成为中国东盟深化经济合作的一个心理障碍。

第三种趋势：东盟把区内外大国引入东亚合作框架以平衡中国的努力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

随着东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以及“10+1”、“10+3”、东亚峰会等机制的确立，东盟在东亚合作中逐步形成了一种“辐一轴”体系，为了平衡中国日益增加的影响，东盟开始追随日本把澳新、印度等大国引入东亚合作框架，形成“10+6”机制。事实上，自2003年提出建设东盟共同体这一宏伟目标以来，东盟区域内一体化进程加快，这提升了其通过加强以东亚区域合作轴心为目标的自我塑造，来提高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尤其是提高其与大国讨价还价能力的欲望和资本。这种能力的获得对于长期以来都坚持大国平衡战略的东盟来说，意味着其在处理对华关系上地位的某种微妙变化。因为平衡战略要求东盟摆脱对某一大国的过度依赖，所以这一点对中国东盟双边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来说威胁是最大的。

三、后危机时期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前景

从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承载超经济诉求这一核心特征出发，结合前面分析的可能影响双方经济合作的几个因素，我们来分析后危机时期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前景。

探讨后危机时期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发展的最重要经济背景就是目前尚未结束的金融危机，基本的判断首先要基于，此次危机是否改变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承载着双方的非经济诉求这一核心特征。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证据显示中国东盟双方已将纯经济福利作为推动双边经济合作的唯一目标（事实上，这种分离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可见，双方经济合作的前景仍将首先取决于中国东盟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意愿，而双方正在并将积极推进双边关系这一点几乎是无需证明的，至少从中方来看是这样。因此，危机不会改变双方继续推动经济合作的愿望。

那么，后危机时期双方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将怎样变化？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安排将朝着怎样的方向发

展呢？

(一) 双方经济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将主要在中多边框架内推进，但前景并不乐观

此次危机虽然没有改变中国东盟双方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而且根据东亚合作具有危机驱动性的观点，还给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提供了动力，但它确实改变了双方开展经济合作的宏观经济背景。对于中国东盟双方来说，此次危机给他们提出的课题是相同的，那就是在后危机时期如何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很显然，危机暴露出来的全球经济失衡使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东盟不得不面对后危机时期经济增长模式问题，有关研究显示，直到2006年亚洲只有很少一部分出口作为最终产品进入亚洲内部市场。作为群体性出口导向型国家，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出口过分依赖区外大国市场的发展模式目前看是不可持续的。

尽管还无法预言此次危机是否会导致二战以来以美元霸权为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真正终结，但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构建区内市场却从上次危机开始就已经成为东亚国家的共识。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东亚“10+1”、“10+3”合作机制逐步确立，并推动了东亚内部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目标的机制化安排。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尤其是2002年开始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不仅实质性推动了中国与东盟双边经济合作的制度化进程，也对东亚在“10+1”框架下的合作安排起到了推动作用，因为此后多个“10+1”自由贸易安排得以签署和落实，而以“10+1”为基础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构想也在推动之中。

因此，在后危机时期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可能将更多在中多边框架下推进，而双边层面合作的注意力将主要放在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本身。因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制度化进程已经领先于东亚合作的整体安排，而对于中国来说，除非东亚合作能取得突破，并在东亚合作中获得认可，那么中国就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崛起。刚刚进行了两次的东北亚峰会尽管目前看尚无实质性成果，但说明中日都已经认识到东北亚合作对于东亚合作整体进程的重要意义。^[3]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下一步将会通过加强东北亚合作来推动东亚合作。这是一个方面，对于东盟来说，在“10+”框架下推动东亚合作甚至亚太合作符合其大国平衡战略，既可以避免在中美关系出现困难时难以

做出选择，又可以摆脱对某一过大的过分依赖，在“辐—轴”体系强化的过程中获得更多话语权。由此可见，双方都更加倾向于在中多边框架内推动经济合作。

但东亚合作的前景不容乐观，因为建设区域市场的利益共识在上次危机后不久就被各方的竞争性考量所覆盖，日本在东亚合作中倾向于一个包含更多大国的“10+6”框架，并对“10+3”框架下的合作安排态度日渐冷淡。^[4]而美国重返东南亚并力推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使得东亚合作的框架之争前景更加模糊，自然拖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制度化。

(二) 就贸易、投资来说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相互依赖性还将加强，但其在促进双边关系方面的效用或将下降

对于出口市场主要依赖欧美的东盟和中国来说，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个严重的考验。2008年下半年以来，双方的经济增长都经历了严峻的下滑，但中国随后采取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2009年上半年增长7.1%，第三季度增长8.9%，第四季度将可能超过9%甚至达到10%。对于正在寻求摆脱危机影响的东盟国家来说，通过加强对华贸易、投资合作，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是最理性的选择。

而自贸区建设本身效能逐步释放也将进一步加强双方的贸易投资合作。因为从今年1月1日开始，双边贸易将有7000多种产品享受零关税待遇，而去年已经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今年也将生效。因此，即使双边经济合作的制度化进程放缓，双边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仍将继续深化。就目前东盟对中国经济的依赖情况看，无论是投资、还是贸易都还谈不上是过度依赖。因此，就算东盟没有动力通过加强机制化推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但也不会有什么反向的动作。

虽然受危机的影响，2009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1.2%，但这发生在中国对外贸易总体下降22.4%的背景下，因此无论中国对东盟市场的出口依赖度、还是东盟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依赖度都没有降低。事实上，2009年中国对东盟出口在中国总出口中的份额从2008年的8%增加到8.6%，是一个历史高点。

从双方直接投资来看，2009年前六个月东盟五国对华直接投资22.7亿美元，同比减少19.85%，但由于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体下降17.9%，东盟对

华投资在中国外资中所占比重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表1)。

表1 东盟各国对华投资变化 单位: 万美元

国别	2009年 1-6月	2008年 1-6月	增幅(%)	2009年 比重	2008年 比重
印尼	6554	5844	12.15	0.15	0.11
马来西亚	22880	13891	64.71	0.53	0.27
菲律宾	6241	8005	-22.04	0.15	0.15
新加坡	190447	252158	24.47	4.43	4.81
泰国	1126	3655	-68.42	0.03	0.07
合计	227248	283553	-19.85	5.29	5.41

资料来源: 中国商务部外资司。

四、结论

总体来看, 中国与东盟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合作制度化的加强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进程性特点, 而双边经济合作与双边总体关系的捆绑则是中国与东盟的战略性。其实后危机时期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的前景主要取决于相关因素的变化是否会改变这些核心特征。本文的分析显示, 尽管后危机时期国际关系的发展存在不稳定因素, 而世界经济格局、尤其是再平衡的走向仍不确定, 但中国与东盟目前已经通过自贸区安排得到一定机制化保障的经济合作将会继续, 双方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会继续加强在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并可能试图构筑某种新的分工模式以应对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压力。从双边合作的制度化前景来看, 双方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对于提升双边经济合作的制度安排表现出很大兴趣, 因而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

多边框架(例如10+3)下推动双边制度化合作可能是一个代替。此外, 由于前面分析的一些制约因素, 经济合作尽管会深化双边经济相互依赖, 但其对双边关系的促进作用可能会有所下降。因为大国的介入以及东盟追求自身影响力的要求会把相对收益思维带入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中。此外, 从理论上讲, 经济合作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一定是有限度的, 它无法超越低端政治而影响双边的安全关系, 也无法为双方的领土争端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责任编辑 王媛媛)

注释:

[1] 例如, 越南学者陈庆就认为“自从有了SED(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有七成与此有关”。陈庆. 牵制与竞争——21世纪初中美的东南亚战略[J]. 南洋资料译丛, 2009(2): 11。

[2] 事实上, 即使在目前状态下, 很多东盟国家也不愿被认为是过分靠近中国。在2008年12月7-8日于吉隆坡召开的东亚大会上, 新加坡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Simon Tay就提出东亚合作应该包括美国。

[3] 日本新首相鸠山最近提出的“东亚共同体”倡议, 虽然没有脱离此前日本坚持的“10+6”合作框架, 但其对中、日在此框架内作用的重视说明日本很清楚中日合作的决定性作用, 即没有以中日为核心的东北亚合作, 无论是“10+3”、“10+6”还是东亚共同体都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4] 刘重力、盛伟. 中日韩FTA战略比较研究[J]. 东北亚论坛, 2008(1)。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a Post-Crisis Era

Wang Yu-zhu

Abstract: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may cause problem for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because of its far-reaching effects on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However, this paper will argue tha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will not change too much, although the binding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bilateral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may be negatively affected, that is, at least we should hope less contribution from bilateral interdepend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ASEAN relations.

Key words: China-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Bilateral Interdependence, Institutionalization